

学人关注

观点秀场

编者按

在东南亚地区，从东南亚高地向低地的人口流动不断重塑着社会空间。本文作者以老挝西北部的实地调查为基础，探究从山区举家迁徙至低地，因失去土地而成为雇佣劳动力的阿卡女性群体，对社会变迁的理解和体验，发现政府主导的人口迁徙逐渐解构和重构了传统包括家户在内的社会权力关系，阿卡女性的自我意识和性别意识不断发生变化。这也提醒研究者关注个体行动者对塑造国内和区域间经济及社会变革所发挥的作用。

■ 李云霞

在东南亚地区，从东南亚高地向处于低地的坝区搬迁、内部安置与各种形式的流动不断重塑着高地与低地社会空间。本文以老挝西北部的实地调查为基础，从流动、生计变化和性别三个相互联系的维度，来探究从山区举家迁徙至低地，因失去土地而成为雇佣劳动力的阿卡女性群体，对社会变迁的理解和体验。

老挝人口迁徙的时代背景

人员迁徙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战争、灾害、饥荒、避难及寻求更适宜生存条件都是促使人员流动的原因。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全球南部人口迁徙背景与民族国家建构、全球资本循环下商业化土地征用进程密切相关。在老挝提出革新开放之后的10多年，从山区到低地的安置引发的迁徙态势尤为明显。与对安置的利弊取向的研究不同，本文从连续性进程的角度分析这个现象：老挝国内人口迁徙与跨境人员、资本和物资流动共同作用下的空间和社会关系生产。

在现代国家之前，处于多国接壤地的老挝，王国和封邑等政体之间的冲突导致了频繁的多方向人员迁徙。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山区的重建需要，老挝政府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助力下在全国开始了较为频繁的安置，其间经历了从“把发展”带到山区，到“将山区人员迁徙到交通道路沿线，或者政府服务相对集中的地方”两个不同的政策导向。

从21世纪初开始特别是在2003年左右，老挝政府加强罂粟种植非法化措施后，内部安置从规模和程度上变得比较显著。然而，对于大多数搬迁家庭来说，罂粟种植非法化只是推动搬迁决定的因素之一，重要原因还在于山区以自给自足为主导的生计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与山区相较，低地经济作物经济不断兴起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老挝民众的生计状况改善。山区人口向低地迁徙潮发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抬高了低地的农业土地价格，政府无法解决部分群体的用地需求，而无地群体的出现为当地农业投资市场提供了雇佣劳动力来源。无疑，从21世纪开始的迁徙与老挝民族国家构建下的市场经济推进密切相关。

人口迁徙导致家户内性别权力关系变化

为了应对区域化和全球化挑战，民族国家通过一系列疆域化政策不断整合着国家-市场-公民之间的关系。政府主导的搬迁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效应，人口迁徙和低地人口集中、个体流动性增强等带来的空间距离逐渐解构和重构着传统，包括家户在内的社会权力关系。

尽管山区与外界的联系并不是截然封闭的，但是如巴尼在《土地、生计与汇款：老泰边境青年向外流动的政治生态学》一文中所述，流动嵌入文化并以性别、民族和年龄为基础。由于在传统社会中山区女性个体的流动可能性低于男性，流动以及适应低地生活和文化无疑为女性带来更大的挑战：劳动力市场需求不稳定所带来的工作机会不稳定、适应与小农经济生产不同的工作要求以及家庭照料的压力。

“每天担心找不到工作而不停找工作，每天打工才能每天吃上饭”是这些无地妇女们的日常生活写照。除此之外，作为降低对现金经济依赖的策略，采集野菜，在日

常生活中是非常耗时的家务劳动，而在低地的食物采集距离更远，这加大了妇女的家务负担。

伴随着在低地生计方式的改变，两性行为也在悄然变化。东南亚流动研究中，女性“汇款”等家庭经济回馈方式通常被看作在道德经济的视角强调女性对家庭经济的贡献，然而却忽略了其现实目的性——获得家户所提供的生计保障机制。与越南等其他东南亚国家相似，在老挝，小农经济持续存在的同时，劳动力市场需求不稳定，家户仍然是组织生计的重要单位。一方面，为了保障生计，妇女们为家庭收益而不断劳作；另一方面，现金经济的依赖导致攀比心理出现。现金收入也改变着女性的能动性，妇女开始为自己购置心仪已久的小商品、防备丈夫吸毒或者赌博或者为孩子能得到教育而攒下私房钱，这些都为妇女们主体性提升提供了物质基础。

迁徙所带来的市场参与，在使这些女性获得一定能动性的同时，也促使她们开始了对个体价值和意义的思考。一位由于父亲早逝而与哥嫂同住的阿卡女孩子对笔者倾诉搬下山的生活变复杂了，在她无法兼顾做工和家务时，哥哥认为她应该放弃打工，她觉得做家务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哥哥所认可的生计贡献，而如果不能持续做工，会被老板解雇。在父权逻辑下，妇女们也面临着群体内部以性别为基础的再边缘化。同样成为雇佣劳动力的男性无法消解新的生计模式给女性带来的压力，而直接或者间接转嫁其生存和适应压力于女性，作为成员之间力量博弈的场域，家户的父权逻辑继续规训着女性。

人口迁徙使得女性自我意识和性别意识发生变化

近期的全球流动研究强调个体流动所涉及的个体心理层面，亨丽埃塔·摩尔在《静物：希望、欲望与满足》一书中指出，在全球时代个体流动可获得的文化来理解身边的变迁和社会转型，并发展出对归属、意义和价值的新解释。流动空间扩大意味着村民们较之前接触到更多信息。对于识字率偏低的群体来说，人际间的互动不仅是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而且是较为有效的认知改变渠道。在与这些阿卡妇女的交流中，笔者注意到了自我意识和性别意识交织在她们日常叙事中。

面对艰难的适应过程，已婚中老年妇女一方面认为比起在山区，她们能见到更多世面，在新的工作和生活场景结识到的人改变着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则用带有宿命论的口吻描述自己作为少数民族妇女的境遇。然而，对于更年轻的未婚女性，她们认为离开山区迁徙到低地增加了接触不同民族和不同国籍男性的可能性，这为她们改变自己和命运创造了机会。在这些阿卡女性群体中，有部分通过做工而获得一定经济自由度的年轻女性认为，流动使她们摆脱了传统的乡间生活，与她们同为女性的长辈一样，婚姻仍然是保障生存和生计的宿命，而与长辈不一样的是她们有了更多的选择配偶的民族和国籍的可能性。

全球化、区域化和国家与公民关系调整进程加剧着东南亚的个体与群体流动，这些宏观机制对微观层面产生了可见与不可见的影响。以老挝西北部的山区少数民族妇女为例，她们应同时看到国家-社会边缘的无数行动者对塑造国内和区域间经济、社会变革所发挥的作用。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 阅读提示 ·

近几年，“她综艺”呈霸屏态势。庞大的女性用户群体是“她综艺”火爆的基础要素，同时也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表征。“她综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单一的女性审美和性别刻板印象，女艺人的价值更投射于女性自身，拓展了女性的群体表达，但也存在议题同质化，内卷严重等问题。要建立女性主体认同的价值观，“她综艺”应敢于尝试触碰硬核议题，真正呈现女性生活中的困境。



■ 郭静 肖辉馨

女性成长与自我觉醒：「她综艺」中的女性群像

“她综艺”是指以女性为综艺节目主角，从女性视角出发，围绕女性的生活、工作、情感、社交等话题展开讨论而量身定制的综艺节目，以折射当下社会中女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主要集中在棚内竞赛与真人秀。近几年，“她综艺”（也被称为“女性向综艺”）呈现霸屏态势。就受众群体的属性而言，女性本身对综艺节目的内容消费就大于男性，女性群体本身又具有强大的品牌转化能力，根据《女性综艺数据研究报告》，女性用户在综艺节目的收视群体中占比高达56%，这一数据在“她综艺”节目中的比重提升至87%，这是“她综艺”火爆的基础要素，同时也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表征。本文试图从最近两年新开播的“她综艺”节目入手，探寻“她综艺”为何异军突起，在发展中又遇到了怎样的创作瓶颈。

超越男性“凝视”，女性话语权力的彰显

“她综艺”是“她时代”综艺节目创作中的缩影。在传统的社会性别文化中，女性综艺节目绝大多数聚焦在美容或时尚领域。新兴起的“她综艺”，打破了这样的单一审美和性别刻板印象，比如在女艺人生活体验类节目《偶像来了》中，宁静就表示“一旦导演不能说服我，我会发脾气”；在全女性脱口秀节目《听姐说》中，王子文首次澄清自己苦恋六年的传闻，还在脱口秀表演中自曝身高、自嘲臭脸。这种叛逆女艺人的设定，超出了以往公众对女明星或知性或温柔的传统认知。

克莱马瑞在论述“性别话语”时指出：“社会权力的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嵌入语言，在语言所创造的世界中，女性的声音受到极度的压迫，因此在表达上更趋向于非语言形式。”所以，以往综艺节目中出现的女性主要定型在表演性展示，而其叙述性性格呈现和分析性观点输出不足。作为“30+”女团成长的某综艺节目，完全超越了男性“凝视”，日常训练和小考的练习区、途中车内空间以及住宿空间内出现的大量对话，呈现了女性间的联盟、信任和担当。代表“男性群体”的主持人黄晓明、代表“社会秩序”的导演组以及代表“评价标准”的三位资深制作人本身都是具有权力地位的，但其权力始终被女艺人的反叛性格和毫不掩饰的观点所消解。女艺人的价值不再投射在男性身上，而是投射于女性自身。

表达群体的拓展与延伸，传播独立观点

姐妹关系（Sisterhood），又被称为“姐妹情谊”，是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中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理论术语。“姐妹情谊”是西方文学中的重要主题，其目的在于共同反抗父权制，号召所有女性，不分种族、阶级、性别差异团结起来，寻找有效的两性对话途径。正是“姐妹情谊”推动了历史上的女性解放和种族平权运动。绝大多数“她综艺”都尊重了“姐妹情谊”这一主题，通过群体拓展赋予她们表达的空间，群体之间在相互扶持的过程中产生互动，更因其在年龄、形象、性格、能力上各有差异，也便能够传播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独立观点。

“她综艺”中，在群体拓展中具有标志意义的节目，除了聚焦婆媳关系的《婆婆和妈妈》、聚焦女性年龄主题的纪实微综艺《女人30+》，还有妈妈视角

下的育儿真人秀《不可思议的妈妈》《新生日记》、国内首档熟龄女性相亲节目《怦然再心动》等。这一系列“她综艺”辐射了女性从女儿、女友到妻子、妈妈甚至是婆婆等多个不同的身份，将过去媒介在议程设置中所忽略的“30+”女性推到镜头前。尤其是《怦然再心动》，虽然参加节目的艺人是“离过婚的女明星”，却没有猎奇和窥探隐私，总导演徐晴始终在强调试图通过节目告知大众“离过婚的女人不是怪物，她依然很美”。

除了年龄外，文化背景差异下的观点输出，也是“她综艺”表达群体拓展的方向之一。主打“她”价值的国际女性智识分享综艺节目《姐妹们的茶话会》便邀请到了来自美国、法国、德国、乌克兰、马来西亚、马达加斯加等多个国家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女性“嗑友团”，打出的口号是要构建新世代女性的谈话场。节目中，THE9-赵小棠提出“男性也有弱小的时候”的观点，#赵小棠恋爱观#冲上了微博热搜，不失为成为观察社会的一个镜像。

困境：议题同质化，内卷加剧

“她综艺”作为“女性视角主导下的综艺”，本意是在女性地位大幅提高和独立意识崛起的背景下，将女性与垂类文化元素相糅合，进行不同议题下的自我呈现与价值引导。但在具体的项目执行过程中，很多“她综艺”内卷加剧，节目名称极为趋同，大量议题同质化。与此同时，女艺人的形象塑造也在趋同，脱口秀演员思文在《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中以独立女性的定位出圈之后，很多女艺人都在加强自己身上独立女性的标签，尚雯婕在《听姐说》中以社恐为主题的表演获得高票后，很多女艺人也表达了同样的社恐困扰，此时的“她综艺”不但没有引领反而是迎合受众。

在价值观传递上，“婚恋焦虑”成为“她综艺”持续不断输出的话题，哪怕是表现单身女性的自由生活，也会用很大的篇幅来探讨其婚恋观。这种打着女性招牌，聊着无聊内容的所谓“她综艺”，看似找到了女性受众所关心的最大公约数，实则在压缩女性议题的空间，显示了传统男权观念的根深蒂固。当“她综艺”的议题延伸空间逐渐缩小，“她综艺”便只能沦为一种主角皆为女性的综艺节目，削弱了其建构女性话语权力的积极作用，也难以产生长效效应。

“她综艺”应进一步延伸议题广度与深度

不断延展的议题边界、相对充分的讨论空间、绝大多数女性群体的共情，“她综艺”在女性群像叙事上做出了巨大突破，也是女性成长与觉醒、“自我”尊严建构的延续。在“她综艺”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两个方向可以继续向下延伸：

第一，除了相对软性的话题之外，“她综艺”要敢于尝试触碰硬核议题。在“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期间，《姐妹们的茶话会》的艺人便通过在脸上涂抹口红的方式向性别暴力说不，类似的尝试，理应更多元、更广泛。

第二，在互联网研究中，与女性相关的议题时常成为爆点，可惜的是，原生家庭、全职主妇、家庭暴力、物化女性等话题，在当下的“她综艺”节目中讨论不足。只有真正呈现女性生活中的种种困境，“她综艺”才能建立女性主体认同的价值观。

（作者单位：山东女子学院）

研究视窗

《将性别带人家社会学研究》

作者：佟欣 李姗姗

现代家庭社会学研究以帕森斯和古德的功能主义为重要开端，并发展出个体化理论和个体生活的社会学。本文认为，新世纪以来，性别视角、女性主义视角和多元交叉视角的理论不断拓展家庭社会学研究，这三个理论视角皆关注性别不平等和性别公正，但也有其内在差异和相互补充。其理论范式和学术立场为家庭社会学研究的知识生产作出了贡献，并对公共政策的出台产生了积极影响。家庭社会学研究加入了性别、女权主义者和交叉观点，对家庭的生活方式充满了批判性，特别是对家庭中的性别关系、工作、家庭平衡、家务劳动和照顾劳动、子女养育、亲密伴侣的性暴力、社会不平等、社会公正、健康的性别差距和 LGBTQ 的家庭的形成过程等展开讨论，将家庭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纳入研究，拓宽了家庭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女性董事、团体动力与企业社会责任》

作者：吕英 王正斌 姚海博

本文基于团体动力学和协同理论，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性别协同和团体协同视角，探讨了团体动力情境在女性董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协同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女性董事长在女性董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中有正向的协同作用；女性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女性董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中存在负向的协同作用，说明女性高管和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作用存在一定的互补和替代关系；董事会团体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影响，但在女性董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协同作用不显著，研究显示与决策团队的学历、年龄、任期等人口统计学特征相比，性别特征更容易影响女性董事在董事会决策中作用的发挥，从而为同性社交理论和基于性别的社会认同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

来源：《财经论丛》2021年第4期

《叙事形变与新时期女性小说的发生》

作者：孙桂荣

叙事形变可以作为新时期女性小说发生的重要见证。从内容上考察新时期女性小说的发生会陷入二元对立的局限，然从政治一体化年代到改革开放，叙事形式的变动却表征了新时期女性小说的发生，体现为性别在场的“我”作为叙述人的设置、女性作为视角人物成为结构文本的中心、叙事话语中的女性声音及叙述主体性的增强等微妙的文体演进与调整等。本文认为，这一时段的女性小说并非源自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而是依据中国本身的文学机制与社会性别运作规律，其在世界上的广泛传播，也标识了这种中国特色女性叙事的价值面向。叙事形变成为新时期女性小说发生的重要见证。

来源：《江淮论坛》2020年第6期

（素波 整理）